

松嫩平原的秋

□修成国



年近九旬的老父亲站在小村东头的庄稼地边，望着大平原上那海洋般的玉米，乐得满脸像一簇盛开的秋菊。

父亲与黑土地打了一辈子交道。那些年整天大喊“跨黄河”、“过长江”，人们成天绑在生产队拼死拼活地干，可亩产连那500斤的“黄河”都跨不过去，更甭说800斤的“长江”了。改革开放以后，包产到户科学种田，亩产一下子就翻了好几番。二弟成旗种的20亩玉米，虽说今年有水灾，还是获得了大丰收。我问父亲：“成旗种的这20亩玉米，今年能产多少斤？”

父亲想了想还是摇了摇头，说：“我猜不出来。”我根据往年的产量，大着胆子说：“亩产2000斤，总收成4万斤？”然后瞅瞅二弟。

二弟笑了说：“还是个保守的数字。今年亩产至少可达2600斤，总产量能达到5万多斤。有的地块能达到3000斤。”

我惊讶地把嘴张得老大：“还什么‘长江’啊‘黄河’啊，这简直是跨过美国的‘密西西比河’了。”老父亲在一旁也有些摸不着头脑了：“去年亩产才2000斤，怎么今年一下子又提高这么些？”

这丰收的景象和喜讯，令人惬意鼓舞。但我知道，收获丰收的成果却是苦差事。“三春不如一秋忙”，根据往年的经验，从割倒、掰穗、拉运、扒皮、脱粒、晾晒，到拉秆棵、粉茬子，真正忙完秋收，怎么也得个把月。用农民的话说，要扒下一层皮呀。人手多的还能快一些，也能少挨些累。可是，村里年轻人都跑到城里打工去了，三秋大忙也不回来，因为他们也嫌农村的活太累。再说，很多年轻人也不大会干农活，这就苦了村中的中老年人了。

我出身农村，深知秋收劳动的滋味。前些年，我曾经对二弟说，有联合收割机就好了。可二弟不屑：“谁家用那玩意儿呀，那得花多少钱呀。”

我说：“一亩地有100多元钱就差不多了。”二弟说：“100多元就不少了，得打好几天工才能挣回

来呢。我这20亩地得花2000多元，得出去打几十天的工。与其花那么些钱用那玩意儿，还不如自己受点累慢慢收了。”

二弟的话我觉得也有道理，村民们有自己的算账方法。今年我终于有时间了，就准备给二弟搭把手忙秋收。尽管我也多年不干农活，但总算多个人手。谁知二弟却笑着说：“谢谢大哥！今年哪，连我都不用出那么大的力了，我已经联系玉米收割机了，今天下午就来，半天就全收拾回来了。”

果然，刚吃过午饭，一台红色的高高的玉米收割机就开到家门门口了，开车的小伙子高声喊着：“快点呀，下午把你家收完，晚上还有两家呢。”于是，全家人立马出动，还有五六个邻居赶来帮忙。

玉米收割机开进那森林般的玉米地里，在一片刷刷的声音中，那又粗又壮又密的玉米，立刻从离地面不到一尺高的地方被齐齐地切断，接着便被吸入机器中。只是几秒钟的工夫，那足有两三米高的玉米秆就变成了碎屑，从机器侧面的出口像雪片一样纷纷扬扬地喷撒出去，又纷纷扬扬地落在了地面上。而那些被数层玉米叶子包裹得严严实实的玉米穗子，瞬间就被剥掉了叶子，黄灿灿的玉米棒子从机器后边的一个漏斗里哗啦啦地流了出来，随即被紧随其后的拖拉机制入斗中，运回了家中的院子里。如同柄柄利剑直指天空的玉米茬子，也被机器上的圆盘耙打得支离破碎，回到了大地母亲的怀抱。秸秆还田，又成了上好的肥料。就这样，玉米收割机每次同时收割两垄，每亩地只需十几分钟。二弟的20亩玉米，只用了半天时间就收完了。

晚上忽然想起二弟曾经嫌收割机太费钱的事，便问了他一句。结果二弟爽朗地笑了：“那是哪一年的事儿了，你还提它？这一晃七八年了，人们的观念早不一样了。那几年我们都身强力壮，不拿出力当回事儿。现在都五六十岁了，干不动了。再说那些年家底子薄，舍不得



尘世忘却的烟火

□和晓梅(纳西族)

姓、李姓、习姓后来也都成了纳西人，纳西语音调高，语速快，音节变化多样，就像一首曲调高昂而又多有起伏的歌。而现在时间好像突然变短了，见面还说古时话，话却明显地短了；地方也突然变窄了，于是，见面点点头，就算是打了招呼。

原住民很多已经移居，于是纳西语很难听到了。

语言的消失会带走大部分的记忆，纳西语随着原住民的搬迁，散落到新城的各个角落，零星地点缀着，古城没有了集中的语言，显出了淡淡的陌生。哪怕商贩招徕顾客的声音无尽的甜美与热情，这种淡淡的陌生还是显出了冰冷。

现在的丽江在小学课程里增加了母语课，孩子们稚嫩的读书声会在校园的某个角落响起，那是一首久违的纳西族童谣，希望它能唤醒那些深深沉睡着的往昔生活。

空出来的祖房，临街的全成了店铺，在巷子深处的成了客栈，交给能干的外地人来经营。古城的客栈真是尽显了主人全部的智慧与情趣，在外面看都是青瓦石墙，悬挂一排灯笼，没有差别，走进一看才知道什么是庭院深深，什么是别有洞天。

客栈要的是氛围，所以一面墙上蔓延着的绿色金银花，某个角落里几株秀气的绿竹衬着旁边白瓷的鱼缸，院中心一盆抢眼的大叶蝴蝶兰，都会让这个院落熠熠生辉。

就算如此，过的都是客，再怎么样换取的也只是片刻的驻足，是横空掠过的目光，视线进入不了尘世的生活。

丽江没有真正意义的淡旺季之分，客栈从来没有萧条过，也不爆满，就是天天如一日的迎来送往，细水一样地流淌。

做服务业，人力需求自然得惊人，很多女孩子从农村、从山里集中到了古城的店铺和客栈，过不了多久皮肤就变白变细，普通话也越来越规整。伶俐的话语，妩媚的眼神，轻蔑

的微笑，渐渐就练出来了。

女孩年轻，根又不在古城，不晓得原来自己站立的地方曾经是家豆腐坊或丝绸店，清朝末期就有了，经历了民国、抗战、“文革”，也经历了地震和地震之后的重建……

不管是哪个年代，古城的清晨都会升起一柱风雨也动摇不了炊烟，那是古城最早的炊烟。然后，烟火次第地升腾，街头卖凉粉的、做早点的、烙粑粑的、烧开水的，各种声音随着烟火的升腾从各家各户关闭着的门窗里冒出来，挤出来，古城就真的醒过来了。

古城醒过来的时候，“李家大院”就会走出来李二奶奶，挎着一只竹篮，永远的青布蓝衫，颠簸的步伐如踩着浅浅的扁舟。她的行走是古城时光的行走，缓慢、摇曳，像一种植物的生长。

李二奶奶路过蔬菜场，路过豆腐坊，路过粉丝厂，路过百货公司，路过糕点店，跟每一个熟识的人打招呼，她会让清晨的阳光紧紧跟随脚跟，会把唱歌一般的声音停留在走过的每一个角落，河边一篮碧绿的青菜上，热气腾腾的早点摊前，某户人家窗下晾晒着的衣服上，孩子们奔跑的脚步声中，都会驻留着她的声音。

现在，“李家大院”依然是这个名字，成了客栈，临着河，一串寂寞的灯笼在夜里倒映在河里，有风的时候，一河都是破碎的红。

这位古稀老人会讲英语，信奉天主教。传教士最早来到丽江的时候，她是混迹在人群中

的孩子，眼睛澄澈得如同黑龙潭新出的泉水。如今，她的行走，她的声音，连同她一切的存在，都是古城生活最尘世的那部分。

“李家大院”进出的都是客人，来得迅速，离开也迅速，相守和偶遇都是瞬间的事情。“李家大院”记不了这么多，就连李二奶奶，连同她曾经携带着的浓淡烟火气息，也将被遗忘在这来来往往的人和事构架的尘世生活里。

花那些钱啊。现在科学种田，亩产逐年攀升，加上其他收入，村里人不在乎使用收割机这几个钱了。听说机器进了村，抢着排号呢。后院的林永盛，看见机器立马从兜里掏出2000元钱，叫机主先给他家收。机主没收，说别人家早就排好号了，大家都是乡里乡亲的，我不能不讲诚信呀。林永盛也只好排队等着了。”据说这机主脑子也很活，雇了工，人休机器不休，白天收两家，晚上还要收两家。

机器收割，比人工要快上几十倍，更重要的是免了繁重的劳累之苦，对农民的身体和精神是一种难得的解放。但它的不足之处也十分明显：只能收割站立的玉米，对倒伏的束手无策。往往收割机收完，还得按垄捡一遍。所以第二天下午，我们同三弟一起下地，帮二弟捡遗漏的庄稼。我们一个人管三根垄，10亩地三个人一个上午就捡完了。捡回来的粮食大约有1000多斤。而且，由于收割机机体较重，被其碾压过的玉米成了一地的玉米粒子，根本没法捡了。我们粗略估算，每亩地虽说也漏了三四十斤。照此推算，全村50多户人家的1000多亩地，如果全部机收，得损失三四万斤粮食，这个太可惜了。不仅如此，机收过程中，庄稼秆被全部粉碎，其实那是乡亲们烧饭、取暖的材料。同时，玉米秆棵还是制作饲料、墙体材料、沼气及其他制品的原材料，就地粉碎又是一种巨大的浪费。好在村中还有部分人家没有用机器收割，留下来的玉米秆大家就串着用吧。很多事都难得十全十美啊。

那天在算账的时候，我问二弟：“你这20亩地产的粮食今年能收入多少钱？”

二弟说：“5万多斤玉米，如果按每斤7角5分计算，可以收入近4万元吧。”说这话时，他的脸上荡漾着笑容。

“那么，你的投入是多少呢？”

他掐着指头，“种子、化肥、农药、柴油等全部投入大约5000元吧，人工不算。”

“不是国家还给了农民一些补贴吗？”

他又掐着指头算着：“一共补三次，第一次种子补贴费1600元，第二次是农药、化肥补贴2000多元，第三次是刚不久补的，是柴油补贴，也有700多呢。”

我算了一下，这几项加在一起有近5000元了。“这么说，你种地的所有投入，国家几乎都给补了？”于是，我编了几句打油诗给他：“农民二哥赛神仙，种地出力不出钱，一年忙乎个把月，到秋收入4万元。”

二弟听了后，憨憨地笑着说：“神仙可不敢比，主要是赶上了好时代。”停了一会儿，二弟又接着说：“其实，也没那么神仙。别看投入少了，收入多了，活计也不那么累了，可这心却没那么静。现在，咱们当农民的基本上还是靠天吃饭。自从春天把种子下到地里，就盼望着风调雨顺。你知道，咱家这儿无江无河，也没有水库，雨水太少，担心闹旱灾。雨水太大，又担心闹涝灾。还担心闹风灾、闹虫灾……一直到秋，粮食进了院子，这悬着的心才踏实了。”吃完晚饭，二弟要帮连夜用机器收玉米的邻居，这日子口大家都是互相帮忙共同出力的，于是他匆匆地走了。

快到中秋了，皓月当空，正是秋收的好时机。田野里到处机器轰鸣、人声鼎沸。村路上，汽车、拖拉机、马车、驴车，来来往往，川流不息；在家家户户的院落里，灯火通明，一片繁忙……松嫩平原大地上，一首欢快热烈的丰收曲，正在凉爽的金风中鸣响。

父亲算是陶家的第19代，一辈子以驾船和务农为生。由于家境贫寒，父亲从5岁就开始做农活，在田里挖稻草兜弥补薪柴之不足，替人放牛补贴家用。

1931年长江大水，祖父母家中仅有的几分田被淹，颗粒无收，仅剩一条载重约3吨的小木帆船搞运输，8口之家的生计难以维持，只能以观音土充饥。第二年，祖父母不得不带着子女们逃荒，驾船来到江西彭泽的一座江中小岛安家。没有住的地方，只得在小岛上搭了个茅棚，让女人们落脚。茅棚夏天闷热难当，冬天则寒风难挡。

为了糊口，家里租种了二东家的两石地，收成五五分成，还要再向东家交租。这点收成自然无法糊口，家里继续驾船搞运输。父亲虚岁16那年，在驾船拉纤时左腿扭伤，伤口发炎、化脓却无钱医治，在痛苦的煎熬中挣扎了两年，18岁时成了“跛子”，走路时一颠一颠，被人戏称为“陶老爷”。

生计维持得艰难，一家人都盼望有条大一些的帆船多赚些钱。恰好这一年冬，彭泽有两条帆船被日本人炸沉，无人认领，父亲便将其中一条船拆成板后拉回了家。有了船板，家里变卖了小船凑出工钱造了一条新船。

运费增加了，一家人又节衣缩食置下了几亩土地，摆脱了二东家的盘剥。眼看日子稍微有点起色，1947年农历二月初二的一场大火，却把这份14年挣来的家业烧成了灰烬，粮食、船和屋子都没有了，所有的梦想全部破灭。

当时母亲刚生下二弟，月子里的母亲为这场火灾伤心痛哭，本有眼疾的她一下双目失明了。

64年后的今天，我还能清楚地记得这场火灾之后几年家里的饭食。冬天农闲季节，一天只吃两餐饭，早餐是稀汤或玉米糊，配上一两只糠粑，吃过之后很快就饥肠辘辘，只盼望晚饭早点到来。可是时间好像是在爬，一天过得是如此漫长，太阳好像永远在天上高高地挂着。那时我总是在想，为什么太阳老不下山？盼来了晚饭，依然是稀汤，依然是糠粑，难以下咽。不吃吧，又饿得受不了，常常是边吃边哭。这样的饭吃下去，童年时的我自然时常尿床，未被发现就赶紧用体温捂干湿处，被发现了则难免一顿揍。

那时候最盼着过年，因为过年时有米饭和青菜豆腐可以吃饱。一家人再买上一小块肥肉红烧，先作除夕祭祖之用，等正月初二客人来拜年时，煮上一碗面条，面上就盖上这几片红烧肉。客人一般只把面条吃完，这几片肉再留到下次待客，不成形的就熬油煮到汤里，如此反复多次。到了正月十五，过完年了，这些许的肉也就打发完了……

然而，家道的艰难并没有压垮父亲。从20世纪30年代到70年代，父亲一直在长江中下游驾船，到了许多地方，接触了不同的人 and 事。饱尝了不识字的苦楚，父亲越发感到



□白涛(蒙古族)

漫瀚准格尔

准格尔，你在鄂尔多斯高原的最东方，最早迎来了高原的日出，最早获得了温暖的能量；准格尔，你斑驳凹凸的大地，仿佛民歌手奇福林那一张起伏难平的脸……漫瀚，莽哈，沙丘，海子，浪涛汹涌着远远地来了，狂热的高原正扬起漫天沙粒与雪霰——苍苍世间兴许根本就没有哪一种调式能如漫瀚调这般直白、执拗、激烈、豪爽、忧伤与幽默！

蒙古人奇福林站在沙圪堵与十二连城的连绵山巅之上，一曲高亢激烈的长歌震颤了准格尔的苍茫大地……

是谁最早把蒙古的草原长调与塬峁沟壑的晋陕民歌拧在一块儿？是谁最先站在高原与山巅之上，唱出那沧桑沙哑而锐利的第一声漫瀚？这远古而来的漫瀚调，秦人出身的始皇帝唱过，胡汉混血的唐玄宗也唱过，中华一家的康熙大帝就更莫说了。都是混合混血，都是搅拌掺杂，都是缠绕纠结，在一起再难分开！北风起时，狼烟伴着马群的腥膻，奶酒伴着唢呐，草原人在歌声中听见了自己的风吹草低；南风再起，麦黍香气飘过黄河，胡麻油蹭亮了羊皮袄，晋陕人在歌声里看见了日子的高低起伏……

据说，这漫瀚调是一片高原与另一片高原的碰撞会合；在高原与高原的中间，是黄河最大的转弯处——八百里河套，晋陕蒙的黄土与黄沙！听说，土默特民间艺人“老双羊”从“风搅雪”中走出来，拼尽一生气力喊出了坐腔；又听说，走西口的后人“万人迷”在“顺天游”里漫游出了二人台。这漫瀚之声散漫开来，弥漫了一大片，风卷着流沙淹没了一切……

此时的大河南北，沙丘上，山巅尖，沙蒿蒿林和柳林子边上，一缕缕青岚升上了天空——“塔奈（蒙语：你）到了玛奈（蒙语：我）家，正好玛奈去会巴雅尔（蒙语人名：喜喜）啦。黄油酪干奶子茶，塔奈的幸运多好啊。瞎眼的脑亥（蒙语：狗）还咬塔奈，塔奈急忙掏出大烟袋，狠狠打它的狗旁盖（蒙语：头），没的款待怨玛奈哇……”准格尔多拉羊旗旗，准格尔多出了个乌云其。乌云其，生得美，爱你的后生实多哩。海莲花，乌云其花，玛奈口背赛百洋（蒙语：我的姑娘美极了！）！”蒙语汉语融合熔化，友情亲善谁个听不懂！草原人听见的是悠扬调，晋陕人听出了心中的欢喜！

这漫瀚调，比蒙古长调激烈，比西部爬山歌悠扬，比起那凄凄惨惨的《走西口》，更是无比的欢快、敞亮！

这漫瀚调，就在歌王奇福林那激情四溢的脸上，放射着油冷冷的光亮和色彩！

这漫瀚调，就在母亲黄河的河套臂弯里漫漶滋长，潮涨潮起，漩流着远去……

读书能改变命运，意识到读书的重要性。

1950年过完春节后，家里日子尚且艰难，父亲还是毅然拿出170斤小麦做学费，送我上了私塾，希望我上几年学，认得字，不做“睁眼瞎”。因为新中国成立，1951年私塾停办，新办小学只要交书本费，我也有幸从小学一直读到了高中毕业。1960年，因为当时的政治环境，成绩优异的我被批为“白专”典型，压力之下不得不放弃读书去参军，回家告别父亲时，父亲说：“可惜书没有读完！”这句话至今让我刻骨铭心。

儿女们没有上成大学，父亲便把希望寄托在了孙辈上。上世纪80年代末我回老家，那时父亲已经病入膏肓，同我的一次长谈，内容却都是询问我如何筹措四个孩子的学费。后来才知道，父亲担心我生活困难，私下一直在省吃俭用给孩子们积蓄学费。

除了强调读书的重要性，经历过新旧社会的父亲更时刻让我们牢记，个人和家庭的成长离不开党和国家。

1951年土地改革，家里分得17亩土地，当时家里刚经历了火灾不久，生活还非常艰难，一向节俭到苛刻的父亲却一下就捐出了几百斤棉花，支援国家抗美援朝。

1954年，长江发生百年不遇的大水，堤坝溃决，房屋倒塌，整个江心岛一片汪洋。父亲同大伯父一起顶风冒雨，驾驶帆船，一连数十日往返抢救被困的乡邻。乡亲们脱险了，可父亲由于劳累过度染上了肺结核，这个病从此伴随了父亲的后半生。

1956年成立农业生产合作社，1958年成立人民公社。从此，家里的土地和船都归公了，父亲也当上了社员。当了社员的父亲照旧是驾船，无论是运输还是送客，十几年如一日，极其认真负责，没有出过一次差错。由于父母残疾，劳力少，还要供我上学，家里向生产大队借了不少钱。1961年困难时期，父亲把家里养的一头大肥猪交公还债，有人劝他以后再还，他说：“公家借钱给我解决了困难，这是恩情。现在能还而不还，这种没良心的事不能做。”

72岁那年，父亲因为肺结核复发离开了我们。父亲虽然没有做过轰轰烈烈的大事，但是他清苦而执著的一生随着他逝去的久远却愈加让人怀念。父亲的音容笑貌常常出现在我的梦境里，儿女双孙也常常提起父亲：“现在生活好了，可惜奶奶眼睛看不见，爹爹（枳阳人对爷爷的称呼）如果能活到现在，到城里来和我们一起生活，看看现在的变化，享享福就好了……”

党在我心中

第二届民族团结征文

国家民委文化宣传司 文艺报社 主办